全面·精辟·公允

——读宋元强著《清朝的状元》

王道成

状元一词，最早见于汉代。汉代实行察举，辟召贤才，时有举状，但不排列名次。凡是被辟召的人，都可以状元相称。科举制度建立后，状元被赋以新的含义。唐、宋两代，人们往往称进士科首选之人为状元，有时，进士科的第二名，甚至第三名也被称为状元。明代初年，政府才明文规定，状元是一甲一名进士的专称。《明史·选举志》说："三年大比，以诸生试之直省，曰乡试。中式者为举人。次年，以举人试之京师，曰会试。中式者，天子亲策于廷，曰廷试，亦曰殿试。分一、二、三甲以为名第之次。一甲只三人，曰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赐进士及第。二甲若干人，赐进士出身。三甲若干人，赐同进士出身。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之名，制所定也。"①这一制度，一直延续到清末。

在科举制度时代，状元及第，具有无上荣光。宋代的尹洙就曾说过："状元登第，虽将兵数十万，恢复幽蓟、凯歌劳还，献捷太庙，其荣亦不可及矣。"②摘取状元这顶桂冠，也就成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理想。明崇祯七年（1634）甲戌科，顺天大京兆蔡奕琛负责主持新科进士的恩荣宴。他十六岁的儿子蔡启僔躲在后堂，亲眼看见旌幢鼓乐导引新科状元刘理顺自中阶而入，高居正席，荣耀无比，他"心艳之，以为士当如是。"从此下定决心，发奋读书，要搏取巍科。康熙九年（1670）庚戌科，果然大魁天下。③蔡启僔是实现了自己理想的幸运儿，而未能实现自己理想的人，又何止成千上万。

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，状元已成为历史的陈迹。但是，状元的影响，却是深入人心。俗语说："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。"直到现在，我们在报刊上还常常见到高考状元、书法状元、垦荒状元、种田状元、养猪状元、植树状元、车工状元、瓦工状元、集资状元、换房状元、制鞋状元之类的称号。状元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个吉祥的字眼，它象征着出类拔萃，象征着同类事物的佼佼者。

然而，对于历史上的状元，特别是对某一朝代的状元，长期以来，却没有人作过认真的研究，不仅缺乏这方面的专著，文章也很少，人们对状元的了解，是非常有限的。

早在六十年代，宋元强同志还在攻读教育史研究生的时候，就萌发了一个愿望：要对中国传统的教育遗产及历代考选制度作些新的钻研和阐扬，力求取得更为公正的认识与评估，以供今日之借鉴。近些年，他在参加白寿彝教授主持的《中国通史》的编写工作中，更突出的感受到：总结历史遗产，弘扬祖国文化，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壮丽事业。中国有几千年的教育传统，历代掌权者都极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。这当中，既有时代的局限与种种弊端，也有普遍性价值和宝贵的经验，需要我们用实事求是的眼光去审断。在一次会议上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周远廉研究员向他提出一个建议：是不是写本关于清代状元的书，探讨一番历史上状元成才的足迹及其社会作用，以求从中获得一些启迪。这项建议，很快得到了学术界几位朋友和出版社的热情赞许。于是，清朝的状元就成为宋元强同志的研究课题。从那时起，他广泛搜集资

料，深入进行研究，历经五个寒暑，终于写成一部长达三十七万余字的《清朝的状元》一书，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。填补了科举制度研究的一个空白。

这部著作，有三大特点。

第一个特点是论述全面。清代的殿试，始于顺治三年（1646）丙戌科，止于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甲辰科，共举行112科。因为顺治九年（1652）壬辰科和顺治十二年（1655）乙未科满汉分榜，各有2名状元，所以，有清一代共有状元114名。以往的有关科举制度的著作，在谈到清代状元时，往往只是征引个别事例。在列举清代的全部状元时，亦不过列举其姓名、籍贯、中式科分而已。宋元强同志对清代状元进行了全面的研究，在《清朝的状元》一书中，围绕着清代状元成才的足迹及其社会作用这个中心，论述了清代状元一系列的问题。本书分七章。第一章，概述了清代的科举制度、状元称谓的由来以及殿试传胪前后的情况。第二章，逐一介绍了清代114名状元的姓名、字号、生卒年、仕途经历和诗文著述。第三章，从各省状元分布的不平衡，探讨了人才成长的自然环境。第四章，从清代的教育制度，家世游学，探讨了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。第五章，论述清代状元成才从政期的德行操守和政坛经历。第六章，论述清代状元的学术成就。第七章，介绍清代状元的轶闻趣事，诸如：状元的寿命、信仰、爱好、风流韵事、文物传说，以及清代的武科状元，太平天国的科举制度与文武状元等等。总之，许多有关清代状元的问题，作者都一一加以论述。其论述之全面，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。由此，可见作者用力之勤。

第二个特点是见解精辟。《清朝的状元》一书，有许多精辟的见解。他对清代状元萃集江南的缘由的分析，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。

清代的状元，分布在全国16个省区及系统中，但是，密度极不平衡，地区间的差别极大。其中，江苏49名，浙江20名，安徽9名，山东6名，直隶、广西各4名，八旗、江西、福建、湖北、广东各3名，湖南、贵州各2名，河南、陕西、四川各1名，而山西、甘肃、云南、盛京等省区，则无一人夺魁。

为什么清代状元的地区分布会如此不平衡呢？清末的陈夔龙在《梦蕉亭杂记》中作过这样的解释：

> “自言游以文学专科矜式乡里，宣尼有吾道其南之叹。南方火德，光耀奎壁，其间山水之钟毓，与夫历代师儒之传述，家弦户诵，风气开先，拔帜匪难，夺标自易，此一因也。冠盖京师，凡登撰席而跻九列者，半属江南人士。父兄之衣钵，乡里之标榜，事甫半而功必倍，实未至而名先归。半生温饱，尽是王曾；年少屐裙，转羞梁灏。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，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，此又一因也。”④

按照陈夔龙的说法，这种差异的形成，有两方面的原因：一是江南文风胜于其他省区，二是江南地区的家族有重视巍科的传统。但是，如果进一步问江南地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文风和传统？我们就会感到陈夔龙的解释还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。

宋元强同志认为：对于这个问题，必须从广泛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中去寻找答案。他从五个方面进行考察：（1）人类社会的发展，包括文化事业的发展，离不开地理环境，离不开经济发展的程度。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，黄河中下游地区，曾是我国经济的重心。但是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北方战火连绵不断，江南却处于相对的安定中，生产力持续上升，经济面貌发生较大的变化。从唐中叶开始，全国的经济重心由黄河中下游向长江中下游转移。至南宋时期最终完成。明清时期，形成了“朝廷财赋，仰给东南”⑤的局面。（2）伴随着全国经济重

心的南移，人口分布的密度也渐渐地南北易位。尤其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“永嘉之乱”、“安史之乱”和“靖康之变”，引发了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大迁移。到了清代，人口分布的重心，明显地偏于东南。在全国11个人口密度最大的府中，江苏、浙江、安徽三省竟占了9个。特别是苏州府，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，人口密度已高达每平方公里1073. 2人。由于一批又一批北方人口的南徙，使江南人的族缘、血缘逐步实现了更新；人口重新进行了组合，居民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。(3) 江南地区，宗族组织遍布。在众多的家族中，普遍保持着一种重视文化的传统，他们广置族田，兴办族学，重视仕途。所以，江、浙、皖三省家族培育的子弟，在科场竞争方面具有雄厚实力。学校教育的发达和藏书事业的兴盛，为江南士子提供了有利条件。(4) 徽州地区，商人势力强盛，他们与官僚结合，互相依托，同时重视功名仕进，采取多种措施，奖掖子弟读书业儒。(5) 自然环境宜人，有利于士子的潜心攻读和宴游交往。饮食结构合理，对人的生理素质与心理素质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。这样的见解，是十分精辟的，为清代状元地区分布的不平衡，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科学的结论。

第三个特点是评价公允。科举制度产生后，就不断有人对它提出批评。明末清初，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对八股取士进行了猛烈抨击。顾炎武说：“八股之害，等于焚书。而败坏人材，有甚于咸阳之郊。所坑者，但四百六十余人也。”⑥戊戌维新运动期间，八股取士更成为众矢之的。科举制度废除后，作为它的特殊产物的状元也遭到了否定。有人说：“中国古代状元，一般是没有学问的。”有人更加以解释说，状元“为了应付考试，只知死啃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，知识面窄而又窄。”他的结论是：“状元确实是封建社会不可多得的金字招牌，可惜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多数是样子货而已。”

读了宋元强同志的《清朝的状元》，我们却获得了完全相反的结论。根据第二章《状元一览》的介绍，清代114名状元，中，有著作传世的达73人。其中有的人，虽没有提到他的著作，但是，不等于他没有学问。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乙丑科状元陆肯堂，会试、殿试都是第一名。《状元一览》中，没有提到他的著作。但是，据史料记载，康熙皇帝曾两次对阁臣说“陆肯堂学问甚优”这样的话，出自康熙皇帝之口，恐怕不会是溢美之词吧。如果我们再看看第六章《著作学识》，我们对清代状元的学问就会有进一步的了解。

乾隆朝编纂的《四库全书》，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。它把我国重要的典籍首尾完整地抄录下来，分编于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四十四类之下，共收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，七万九千〇七十卷，包罗宏大，丰富浩翰，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之总汇。对于这部宏篇巨制，当时的状元就作出了重大贡献。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，安徽学政朱筠奏请开局搜辑《永乐大典》中的古书、大学士刘统勋认为这项工作非关政要，欲寝其议。当时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的于敏中（乾隆二年丁巳科状元）却力排异议，据理力争，促成了《永乐大典》辑校工作的进行及《四库全书》的开馆。根据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七月四库全书馆开列的任事诸臣衔名，有七名状元曾在四库馆任职。自乾隆后期至嘉庆初年，共有十名状元参加了《四库全书》的纂修。按照清人的说法，同时在世的状元，不会超过十三个人。而《四库全书》的纂修，竟有十人参加。这不仅仅反映了清廷对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重视，也反映了当时殿试夺魁者的学术水平。

清代的状元，多擅长诗词。清人张维屏撰写的《国朝诗人征略》一书，收入了清开国以来的众多的诗人，其中有状元十九人。但是，此书刊行于嘉庆（1796—1820）年间，此后的状元如陈沆、龙启瑞、翁同和、吴鲁、张謇等也有较高的诗名。清代的状元诗人，数目是相当不少

的。

兴盛于乾嘉时代的考据学，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，许多状元在这方面做出了成绩。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毕沅，不仅他个人著述甚丰，而且利用他的地位和影响，延揽名士，大力提倡，促进了这一学派的发展，被梁启超称为考据学的“护法神”。他和当时著名学者严长明、程晋芳、邵晋涵、洪亮吉、孙星衍、章学诚等协力编纂的《续资治通鉴》二百二十卷，更是学术界公认的史学佳作。

其他如吴其濬的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六十卷，实际上是一部大型的植物地理学，它开了我国近代植物志的先河，受到了日、美、德等国学者的推崇。洪钧的《元史译文证补》为元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，对西北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由上所述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：清代的状元并不是“只知死读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，知识面窄而又窄”，更不是“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”把历史上大多数的状元说成“样子货”，是不符合实际的。

我们不能说状元的大多数没有学问，也不能认为封建社会的状元在政治上不值一提。从《政事德行》一章中，我们可以看出清代一些状元的表现是相当好的。康熙（1662—1722）年间，康熙皇帝打算派遣满洲三品以上大员巡按各省，大学士徐元文（顺治十六年已亥科状元）认为，这种做法，必将给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，极力谏阻。康熙皇帝勃然大怒，廷臣皆惶恐万状，不知所措。徐文元却像平时那样侃侃而谈，终于说服了康熙皇帝。乾隆（1736—1795）末年，大学士和坤，倚仗皇帝对他的宠信，专横跋扈，结党营私，招权纳贿，京城内外不少文武官员奔走于他的门下。大学士王杰（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状元）却绝不与之交。一天，和坤拉着他的手说：“何其柔荑若尔！”王杰正色回答说：“王杰手虽好，但不会要钱耳！”羞得和坤满面通红，退了回去。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，一些人丧失了民族气节，效忠日本侵略者，在北京成立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。清代最后一科（光绪三十年甲辰科）状元刘春霖的好友王揖唐一度任委员长，多次邀请刘春霖前往任职。但是，每回都被拒绝。一次，王走后，刘春霖对着门外说：“这些筋骨软的东西！”这些表现，不仅在当时是难能可贵，在今天也是应该肯定的。

清代的状元在人品和学问方面之所以有如此良好的表现，和中国古代的教育传统和考选制度是分不开的。作者认为，在封建时代虽然流行着追求功名利禄、荣华富贵的教育观，但是也流行着儒家“尊德性，道问学”也就是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教育观。这种教育观，主张内与外并重，道德与学问并重，修己与经世并重，把人伦道德看成是立身处世的根本。在这一教育传统的影响下，相当一批人能体察民情，重视名节，博学多识，干练通达。而科举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：不拘门第，平等竞争，公开考试，优胜劣汰。清代的 114 名状元，都是在这套制度中艰难竞争，脱颖而出的。凡跻身鼎甲者，绝非平庸之辈。科举制度之所以受到有志之士的反对，不是由于科举的方式而是它的内容。古代的教育传统和考选制度，对于我们今天，仍然是值得借鉴的。这样的评价，是在深入研究了清代全部状元成才的足迹及其社会作用之后作出的，是实事求是的，公允的。

目前，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，大致有“宏观研究”和“微观研究”两途。前者注重观览大局，探索规律；后者着力索隐探微，考订名物。不过，有一些学术界同仁，还主张倡导一下“中观史学”的研究方法，即横向或纵向撷取一组历史现象，从个案探索入手，而后综合出本课题所能作出的、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结论。这种方法的长处是可以避免空泛的议论，游谈无

根；也可以避免只见树木，不见森林。作者认为，这种方法是值得重视和提倡的。《清朝的状元》一书，就是对这种方法的一个尝试。实践证明，这一尝试是成功的，卓有成效的。这部力作，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---

①《明史》卷七十，《选举志》二。②田况：《儒林公议》。③徐倬：《蔡启尊传》，《国朝耆献类征初编》卷一一六。④陈夔龙：《梦蕉亭杂记》卷二。⑤张大复：《梅花草堂集》卷一〇。⑥顾炎武：《日知录》卷十六，《拟题》。⑦王亚平：《状元多是样子华》，《北京晚报》1983年8月11日。